

另眼東瀛，視覺文化與工藝創作的鉅變 武士、皇室與町人的工藝之尚

撰文 | 洪昱濤 圖版提供 | Liang Yi Museum

日本傳統工匠們的審美意識，其智慧才華在精緻的物質形式中獲得張揚，其情感理念於風雅的精神品格裡得以滿足。兩依藏博物館收藏逾4000多件日本工藝品，涵蓋多元形式及風格，見證日本自江戶時代至現代，其藝術與社會之間緊密相依的關係。

「另眼東瀛」自館藏中精選260多件日本工藝品，引人一探日本的視覺文化如何反映閉關鎖國的江戶時代至現代化早期的西學東漸的鉅變。策展人方顯諺表示，展覽聚焦日本的17至20世紀這段至為關鍵的時期，以江戶時代（1603-1868）為始，那時武家主導整個社會，他們的武士道精神引導著整個社會的思想與行止。19世紀中葉，武家權力大不如前，將軍幕府的武士甚至被禁止攜帶任何武器。與此同時，新興商賈階層——町人（chōnin）逐漸崛起，他們不僅推動了當時日本的經濟活動，更促進各地的文化交流。策展觀點側重於不同社會階級與工藝品創作之間的聯繫，以及在這個漫長而關鍵的時期中產生的美學變化。

「另眼東瀛」分別由江戶時代的武士美學、江戶町人文化、明治時代的皇室遺風和日本現代的工藝品等角度，檢視各階層蔚然成風的文藝潮流與樣貌。正如兩依藏博物館館長馮依凌所言，本次展覽通過武士、皇室和町人3個階層的視角展開，每個展區卻都顛覆了觀者的預期——武士展區所見的並非快刀利劍，而是茶具和文房器具；皇室展區呈現的是小巧精緻的銀盒，而非畫卷或書法；而在町人部分，並非陳設和服或木版畫，而是品類眾多的髮飾，「我們試圖沿這些出人意料的工藝品，緩緩掀開那段極為動蕩、壯烈時期的帷幕，提供觀者認識『日出之國』的嶄新視角。」



上圖 矢立是一種可攜式的書寫用具，由毛筆筒和墨水瓶兩大部分組成。這件葵紋槍形矢立為火槍造型，其在16世紀由葡萄牙人引入日本，是武士階級廣泛使用的一種武器。

下圖 在江戶時代，只有中高階層的武士才被允許配備馬匹。這對馬鐙上鑲嵌的泡桐花紋，流行於鎌倉時代晚期，用以表彰重臣。

左頁圖 19世紀（木胎時繪婚禮箱）為美國著名慈善家芭芭拉·赫頓（Barbara Hutton, 1912-1979）的舊藏，其以木胎時繪的工藝裝飾，並綴有獨特花卉圖案和飛翔形象的雉鳥，這些圖紋均有吉祥、貴族的含意。

日本典型審美文化的形構

日本在7至8世紀時深受隋、唐兩朝影響，創建相似的中央集權制度。隨後幾個世紀，天皇的統治穩若泰山。直到鎌倉時代（1185-1333），武士階層勢力崛起，皇族、朝廷權力式微。將軍取代天皇手執權柄，形成武家、宮廷分庭抗禮的局面，一直延續到明治時期（1868-1912）。

在武家政權崛起前，平安時代（794-1185）的文化奠定了日本的美學基礎，形構日本典型的審美文化——貴族們有感於萬物的轉瞬即逝，因而名之「物哀」。「無常」的概念隨著漢傳佛教東渡進入日本，人們以自省為法門，藉此探求平靜和至善，種種表現衍生出以「侘寂」為名的美學表現。

儘管皇室仍是各項工藝的主要支持者，但江戶時代的將軍、武士以及新興的富裕商賈（即町人）也時常委託匠人製作工藝品。這些受託而作的工藝品反映了不同階層的美學理念。17世紀時，武士的文化修為開始獲得重視。「智勇兼備，文武雙全」的傳統早見於平安時代，而在江戶時代則被武士階層奉為圭臬。武士要追求文藝、武藝兼具，茶道等獨特的文化因此而有所發展。

另一方面，隨著大城市的崛起、商賈財力和影響力日益增加以及交通驛道的改進，藝術不再是貴族專屬之物，更為廣泛地進入了町人階層的日常生活當中。町人順應商業城市的急劇發展而經商獲利，他們在經商之餘仍要面對幕府政權的壓制。在這個行為規範極其矛盾的時代，江戶町人發展出特有的文化，堪稱亂世浮生的日常美學。





武士美學，首重文武為一

日本封建時代的武人分為將軍、大名和武士3大階層。幕府將軍是保衛朝廷的世襲軍事領袖；大名是地區領主，掌控土地並可組織武士團體。在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管轄約有200位大名，逾40萬名武士。德川幕府對民眾施行嚴格的統治，也制定武士道以控制武士階層。幕府政權區分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的階級結構以維持和平。由於沒有重大的戰役，許多擔任軍事職務的人員轉而從事文職工作，而開始沉浸在貴族的傳統中。武士道不但強調對幕府的忠誠，同時規範武士的行為和生活，嚴以律己，自省修身。武士道指出：「武士的雙手既要持弓擊馬，也要握筆寫字」江戶時代的武士們需要嚴守指示。

策展人方顯諺指出，出於侍奉需要，武士必須具備文化素養，以便撰寫文件及書信。有些武士會使用硯箱存放文具，如硯台、水滴和毛筆。而另有一種便攜式的毛筆和墨水盒

則更受青睞。名為「矢立」(yatate)的文具不僅獨見於日本，武士們更會挑選矢立作為自衛之用——武士因「矢立」而集文、武之藝於一身。

在德川幕府統治下的250年和平時期之前，馬匹在戰爭中被廣泛使用。因此馬術成為衡量一個武士能力必不可少的指標。譬如流鏑馬便是其中一項考驗武士騎術和射箭技能的活動。這項活動起源於鎌倉時期，起初用作戰爭演練，其在室町(1392-1573)至桃山時期(1573-1603)一度式微。直到江戶時期再次興起，江戶武士傾向於視其為文化遺產，而非實際的戰術演練。馬鐙不僅是實用的馬具，也具有裝飾美觀、展現社會地位的用意。許多馬鐙上鑄有家族徽章，便為一例。

武士的茶道

日本茶道的歷史可遠溯至9世紀初，當時只供禪宗僧侶及貴族參與；而在江戶時代，茶道是不同階層之間的聯繫工具，茶室更成為重要社交和拉攏政要的場所。豐臣秀吉(1537-1598)甚至建造了「黃金茶室」——一座便於隨行的鍍金茶室。他在1586年將其運到京都御所，以接待正親町天皇(1557至1586年在位)。黃金茶室中使用的茶具皆為純金或鍍金製成。江戶時代的武士們仿效豐臣秀吉，紛紛建立了自己的茶室，蔚為一陣茶具收藏之風。

大名古田織部(1544-1615)師從茶道大師千利休(1522-1591)，並擔任德川家族第二任將軍德川秀忠(1579-1632)的茶道顧問。千利休對茶道影響深遠，奠定茶道禮儀及茶室設計的典型，使其符合「侘」的美學追求。大名小堀遠州(1579-1647)作為古田的弟子，繼承了「侘」美學的衣鉢。德川幕府次任的茶道顧問片桐石州(1605-1673)亦隸屬此門派，繼往開來。江戶茶道因此成為武士精英階層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而這種由武士階層實踐的茶道，則尊稱為「大名茶」。

以享樂為尚的江戶城市文化

德川幕府設立嚴格階級制度和各類法規，藉以統治民眾、穩定政權。上層社會由武士精英組成，底層則是農民、工匠和商人。江戶時期之前，商人屬於社會底層末流，然而在江戶時期，他們與工匠共同為武士和貴族提供漆器和禮儀用品等綺麗豪華的商品，並被統稱為「町人」階層，社經地位因而提升。

新興的「町人」階層坐擁不少財富，但由於僵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他們想向上層社會流動也受到限制。許多町人因而耽於享樂，將注意力轉向「吉原」——盛行於17世紀的煙花之地。「吉原」影響了各種藝術和工藝品的發展。如藝妓通常會根據季節來佩戴飾品——在夏天時佩戴象牙、玉石和銀



的髮飾，冬天則佩戴玳瑁和珊瑚。隨著「吉原」的藝妓人數日增，導致玳瑁髮飾供不應求。「歌舞伎」的普及也衍生出以戲劇內容為題的木版畫。

明治帝國的遺風

德川幕府統治日本超過250年，直到1868年「明治維新」被天皇的支持者以「尊王攘夷」旗號推翻，武人逐漸失去了階級的特權。1876年，朝廷頒布「廢刀令」，標誌性的武士髮髻髮型也不復存在。明治天皇終於成為名正言順的國家元首，在幕府倒台後重新獲取對外、對內政策的政治實權。天皇及其皇室家族的家徽是菊紋，即一個花蕊被上下兩重各16片花瓣交錯環繞而成。明治時期的日本，經歷了快速改革和西化的階段，明治天皇旨在增強國力，使其足以媲美歐洲列強。日本皇室在1889年的明治憲法典禮上，開始委託工匠製作糖果盒(bonbonnières)作為紀念品之用。這種工藝品源於法國，用於贈予前來出席皇室宴會和儀式的賓客。糖果盒不僅向參加皇室活動的外交官宣傳日本文化和工藝，還提供就業機會，安置曾經以製作刀劍武器等維生的工匠。日本在世界博覽會上賣力推廣本土產品，也使日本工藝品揚名海外。

皇室也透過資助當地工匠製作糖果盒，培育國內的工藝產業。

日本工匠一如其國族，紛紛向異域們汲取靈感，以求革新。在1920年代的裝飾藝術時期，人們發現圖坦卡門國王墓，埃及復興運動影響了西方的設計、建築和裝飾藝術。同時期的日本工匠也受其影響，透過大正和昭和時期的文化多樣性，展現出20世紀初的日本工匠應對異域文化時的兼收並蓄。

「另眼東瀛」含括江戶封建社會到現代日本的漫長歷程——見證幕府統治下的江戶時代，武士階級的不可一世、閉關鎖國的孤立主義和嚴格的階級劃分。而在隨後的數個世紀，權力逐漸從武士階層向町人轉移，最終回歸到明治時代的皇室。策展人方顯諺認為，藝術反映了社會與文化現象，「另眼東瀛」展覽以小見大，探視另一重日本風貌，展品聚焦於象徵武士精英階層文武兼備的文房用具和金屬製品，而女性髮飾和浮世繪則對照江戶町人的燈紅酒綠，至於明治皇室委託工匠製作的小銀盒，更是匯聚了傳統日本文化和西方的美學影響。

左、右頁圖 兩
收藏博物館「另
眼東瀛」展場空
間